

转型文库

丛书主编 冯绍雷



# 转型体制下 各国政党体制与 选举制度研究

包承柯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转型文库

丛书主编 冯绍雷

# 转型体制下 各国政党体制与 选举制度研究

包承柯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体制下各国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研究/包承柯

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转型文库)

ISBN 978-7-208-10768-7

I. ①转… II. ①包… III. ①政党-政治体制-世界-文集②选举制度-世界-文集 IV. ①

D564-53②D5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8868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转型体制下各国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研究**

包承柯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9.5 插页 4 字数 390,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768-7/D·2087

定价 62.00 元

## 丛书总序

最近四十多年来发生在欧亚等地区许多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大概是近半个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与各国的国计民生最相关联,因而也是令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转型问题不可避免地是充满着争议的学术领域之一。所以,对于转型问题的研究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今国际国内学界各个领域所重视的对象。

### 一

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问题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叫法,最为普遍的叫法就是“改革”。但是“改革”一词原来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一般说来,前者意味着是在基本宪政制度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体制变化,而后者指的是改朝换代式的基本国家制度的更替。但是,最近三四十年中所发生的体制变革似乎打乱了这种词义上的区别。体制变迁既可以发生在宪政制度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之下,例如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推进的改革;同时,也可以发生在社会基本制度发生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当中,就像伴随着苏联解体所出现的这一场先叫“重构”,后来又叫“改革”的制度变迁。发生在俄罗斯的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如此重大变化的转型,尽管其形式是那么激进,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却认为这场变革的内容中还是透露出了很多的传统基因。而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渐进性、局部推进式的改革,从形式上看是比较稳健的,但是,按照邓小平的理解:改革就是革命。

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所包含着的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变革本身已经说明其内容之复杂、其形式之多样、其背景之深远,而这样的复杂多样的体制变革却集中发生在最近这三四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且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足见其非同一般。根据不少国际学者的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制度转型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欧洲南部首先开始的。当时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先后发生的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的变革引发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转型进程。在此之后,大体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人文、地缘、经济,以及传统纽带的联系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和东亚差不多同时大规模地开始了从军人专权或者威权体制向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发生在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进程,实际上更早就开始了。最早甚至于可以追溯到二战刚刚结束时在南斯拉夫地区出现的变革过程。南斯拉夫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于在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苏联关系上)寻求各种类型的“自治”的努力相当直接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而50年代中期先是改革,而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变又深深地影响了6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在大多数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断断续续地延伸到80年代后期。紧接着的就是令整个世界措手不及的先是东欧、后是苏联的以政治剧变为标志的冷战的终结。

出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并且是有着不同类型和具有不同影响的体制转型过程,大体上有着相似的社会历史内容,那就是从传统的权力较为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形式可以是军人政权、政治威权体制,也可以是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的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这样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转换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种族肤色、地理方位,包括发展水平和国家实力等各种差别,显示出五彩斑斓、声势浩大的局面。

按照科尔奈的说法,发生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的体制转型进程,是自世界历史告别中世纪,进入近代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历史

的变革。这场体制转型所具有的巨大规模和深刻意义唯有工业革命和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这样的大变革才可以比拟。如果从所涉及的国家来说,从南欧到拉美、从东亚到东欧、从非洲到南亚,大多数非欧美国家都被卷进了这样一个民主化、市场化的宏大进程中,其规模与气势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从变革的深度和影响力来说,一方面是激发了这么一大片国家和地区的活力,提升了它们的实力、效率和发展水准,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面貌,使之在当今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的欧美列强抗衡的格局;另一方面,由这场大变革所引起的冲击和动荡也足以令人瞠目,其中最为让人料想不到的就是苏联的解体,包括东欧的剧变。

这样的一场大变化,除了少数地区和国家,基本上是在兵不血刃的和平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也就更多地留下了关于体制与社会转型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与意见,迄今难以统一。这一时期各国各地区内部体制转型进程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伴随着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外部的宏大过程:全球化。现在的研究还没有能够搞清楚,到底是20世纪末叶的全球化过程引发了各国内部的体制转型,还是相反,由各国体制变迁推动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求解的“蛋生鸡”与“鸡生蛋”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种现象互相作用而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 二

对于这样一种以政治经济体制转型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的研究,即使在有着丰厚学术基础的西方,也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其原因就在于体制转型本身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不久的历史过程。

在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学科分类去描摹这样的一个新客体的情况下,在西方,有人将体制转型问题的研究干脆称之为“转型学”。但是

对于转型研究的学理背景、学科基础,乃至至于范畴体系和学科方法则迄今还是众说纷纭。也有人认为,对于体制转型问题应该以传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导来展开研究,但是,传统经济学主要从事静态的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体制转型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传统政治学受到经济学较大的影响,多半程度上更集中在稳定态制度的研究,较少有像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样的作品。近来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体制转型的研究应该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的门类。从现象上说,体制转型涉及政治博弈、经济运行、历史背景、文化传承,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当然是一个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知识领域,但是如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知识用来解释和分析纷繁复杂的转型现象,还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并不是来自各种不同学科门类的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就能够形成多学科研究的,而是必须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方法上有更多的创设才能够成其事。

与转型学研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按照科尔奈的说法,转型研究不太关注一些具体细节问题的考察,而是主要集中在一些宏大问题的讨论,以及各个转型领域的相互关联性问题的研究之上。这一观点又为我们从事转型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也即,转型研究是远远超越了一般学科意义上的知识门类,而是一个反映当下过程动态特性,也因之而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的一个知识门类,但是,这样一种全新知识结构的形成需要相当完备的信息系统的支撑,特别是对于各学科知识积累的汲取和荟萃,这是需要长期艰苦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事情。

总之,相对于根基深厚的传统学科,犹如历史学、哲学、文学这样枝叶繁茂的学术构建,转型研究的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

然而,当下急剧变动中的社会对于理清自身发展的轨迹与脉络,对于这样一场如此激荡人心的社会大变动的深入分析与认知,都迫不得已地将转型研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特别是需要将转型研究置于一个认真合理地构筑的知识框架之下。于是,就有了总结和整理迄今为止

的有关体制转型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并尽可能地将其系统化,在切实地推进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将其逐步地理论化的诉求。

虽然理论和实践的积累都还相对薄弱,但是,这种转型研究已经在各个学科方向上迅速地铺陈开来。

### 三

对于转型问题研究较为直接的兴趣和需求更多地是来自关乎转型进程本身的问题。这里包括有关转型的发生及其背景、转型的进程与周期、转型的速率、转型的功能与效用、转型的比较研究、转型成效的评价标准等问题。

转型这一现象之如何发生,以及转型发生时的状况始终是一个使无数学者着迷的问题。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中的解释,20世纪末叶体制转型具有重要的共同背景:其中包括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世界性的经济增长、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外部行动者的改变立场,以及“滚雪球”效应。而按照林毅夫的判断,转型之所以发生,更多的在于社会思潮所起的作用,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一时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秋风扫落叶般的席卷全球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林毅夫所指现象的意义。但是,对于任何思潮而言,如何具体地作用于转型实践,还是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才能理清脉络。包括对于“新自由主义”一类思潮,究竟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何种影响,恐怕也不是简单的“扣帽子”甚或大批判所能说清楚的问题。

转型的进程与周期问题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这里包括的问题是体制转型进程是否有一个一般的模式;是否只能够以政治,或者只能够以经济,或者只能够是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开花为起点;是否必须承受改革初期的大规模经济下降的磨难,等等。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所谓的“第二次转型”问题,也即人们发现,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正在出现一个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



型的不同程度的调整和逆转,以克服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次转型”所带来的“体制陷阱”。比如,在俄罗斯就出现了普京式的部分地加强中央权力以维持稳定的重大调整,这一现象也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中出现。于是就产生了改革要以怎样的进程与周期推进才能够取得效用的问题。

体制变迁中的绩效评价问题,到底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是以体制建设的进度来加以考察,是以执政党的选票多少来考量,还是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实际程度来加以区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时期,乃至于一届政府对于这样的绩效评价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学者们关注这样的评价,是有着一系列的理论考量的:不能够以牺牲当代来服务于将来,也不能够只是以民粹主义的态度取悦于民众,而不顾及未来的长远发展。

包括体制转型的进程是否能够相互比较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界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争论问题,而且,也是决策和实务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比较是相互借鉴的前提。回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前期,我国学术与决策界对于苏联东欧地区的改革经验与教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望能够在当时我国自身实践经验相当匮乏的背景下,从彼处取经。当时这种相互比照借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我国与上述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未曾料到的是,当我们还想继续从苏联东欧的经历中寻求知识和取得灵感的时候,它们自身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比较研究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提瞬间消失了。当然,所谓的转型比较研究还包含有更加广泛的内容。比如,在南欧、拉美、东亚、东欧等地区各不相同的转型问题究竟是否存在着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学界并未就此得出一致意见。

这样一类转型问题的定位与界定、本色与特性、进程与周期、速率与节奏、绩效与评价、比较与借鉴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属于转型本身问题的研究。

## 四

对于转型问题的另一类研究是有关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有关体制转型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有关转型进程中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有关历史传统与当代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转型问题的研究之所以会超出传统学科的范围，多半是由于存在着对于这一类宏大问题的考量；同时，这也是转型研究不仅富于理论性，而且，还富于相当浓厚的战略与决策特性，甚至于还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个重要背景。

对于体制变迁与外部环境相关性的观察已经非常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国际学界的重点话题领域。用我们习惯的话语来说，这个问题研究的就是改革和开放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经常会习惯地指称，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动开放。好像改革与开放之间只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实际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开放过度又会成为阻碍体制变迁与破坏稳定的重大灾难。比如，1997年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东南亚国家金融体制过多地受到外资侵扰，以及随后多年的动荡，反映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在当前的国际学界，国内体制变革与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关联性已经受到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广泛的关注。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惊呼，当今国际秩序正在被“欧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中国与俄罗斯的权威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这样的区分重新一分为二，似乎两相对立的冷战又要重新点燃战火；而自由派人士则依旧悠然自得于“当今国际体制如此完备而富于弹性”，因而足以吸纳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加入这一体制。在我看来，恐怕这两种趋势都未必成为将来的现实，而正在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与国际体制的互动才是构建未来国际秩序的更为可能的选择。无论上述的哪一种观点都表明了，体制变迁问题已经与国际体制的重构问

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转型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敏感,但也是相当基本的问题,便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之,就是政治体制与经济相互关系问题。有人将这一问题表达为政治民主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比较普遍的社会思潮是将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认为只有同时实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才能取得成功。近年来,来自波兰,但却在美国长期任教的普热沃斯基经过了对上百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他自己的结论。他认为,在中短期的背景之下,无法对转型时期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政治民主化了不一定能够确保经济的增长,相反,经济发展了,未必就一定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

虽然,就像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普热沃斯基依然是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但是,他经过认真研究所得出的相当务实的结论却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关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与当代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至少目前有这样的几种说法。一派意见强调政治文化的继承性,认为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代制度变迁,但是另一种意见强调传统文化与当代变迁之间的断裂性,并认为,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观察当代制度变迁,难以解释为何一种文化,在某一个时段会倾向于变革,而在另一个时段,同样一种文化会拒绝这样的变革。

几十年转型研究的实践对于这样一类宏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无数重要的实证材料,使得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一整套理念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中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强调的一步到位式的、政治经济全方位推进的,以及激进的改革路线只是获得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结果;事实表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试错式”的稳健型改革相形之下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能够从理论上提供一个完备的模式,但是,实践为理论的构建创造了前提。

## 五

再有一类转型研究是关于转型进程中的“范畴研究”。其中既包括像转型中的“要素”或者“现象”问题的研究,比如,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体制转型中的作用、官僚和体制转型的关系问题、转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还比如,转型中的腐败问题、体制转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等问题。也包括更加广泛意义上与转型问题相关的范畴问题的探讨。

在转型现象千变万化,尤其是其结果与进程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的时候,任何抽象理论的推导都比不过实践的丰厚。因此,我建议,在对于转型现象还需要进行非常深入细致的理解和研究的情况下,抓住几个要害问题,从内容较为有限的“范畴”的角度着手,形成对于某一领域的转型问题的深入洞察,这可能是研究转型问题较为容易的突破口。

本丛书是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欧洲研究中心的同仁在多年从事转型研究以后初步成就的一个汇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选列了事关转型研究的一系列关键性范畴。比如,我们选择了“帝国”、“后现代国家”、“联邦主义”等范畴作为切入口探讨转型国家的国体与政体问题;我们还选择了“移民”、“选举”、“第二次转型”等范畴讨论典型的转型现象问题。类似的题目我们还将继续作出进一步的选择。

但愿从范畴角度的伸展能够为总体的转型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和新的方向,这是我们的一项新的尝试。

冯绍雷

## 序 言

《转型体制下各国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研究》是一本反映国外从事选举研究的学者所论证的选举制度和政党体制及变化的理论论文集。本书收集了多位政治学者撰写的16篇论文,就20世纪末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社会转型之际,创建新的选举制度和政党体制,以及欧美亚等国家在选举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理论问题进行的论证和分析。国外对政党和选举制度的研究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基础,这些研究是通过对选举获得的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国家在转型时期选举制度建设时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本书通过编译和介绍国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俄罗斯与东欧转型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机制及选举制度的变化带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帮助我们了解国外进行选举制度研究的现状,以期推动我国政治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原苏联和以东欧国家为中心的许多国家的国内制度发生了动荡和变化,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开始尝试通过建立新的选举制度,来调整国内政治力量,因而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政治行为等方面新的、深刻的变化。这些初创型的政治体制、选举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和选民的投票行为都成为学术界关心的课题。不少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期都采用单一选区的选举制度,由于该制度的特点是有利于较大政党而不利于较小政党,使得这一制度在转型初期国家中,并不能够维持很长时间,就逐步改变成以比例代表制为主要特征的选举制度。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要求对现有选举制

度和政党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界曾发展出第三种政治势力,以求改变长期以来两大政党政治对立的格局,但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党体制并不容易,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国会的选举制度实行的是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根据已有的选举制度的理论认为,这一选举制度并不有利于第三政党的出现。日本于1994年开始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即从半比例代表制的中选举区制改变到单一选区与比例代表并列制,从而出现了国内政治力量新的重组,原来的保守革新政党体制转变为两大保守政党为特征的政党机制,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选举中获得多数,从而取代了长期执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以及美国、日本政党体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海外学者就这些国家的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先后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论著。现在本书将其中的精华编译成集,希望能为国内学者在研究各国政治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国外的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研究一向是各国政治学者关注的中心课题之一,选举政治的结果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后带来的变化,使得许多政治学者关注和研究选民的投票行为和选举政治。由此,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党体制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呈现相当丰富的成果。从欧美的选举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到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已经出现了种类繁多的不同的选举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从制度研究转向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关注,以政治心理学为主要研究视角的行为主义分析、以微观经济学的成本和效用为特征的合理选择分析理论和以政治社会学为特点的社会结构分析理论逐渐盛行。这些分析方法的形成和多种新分析方法的引入,对于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变化的内涵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由于新制度主义的盛行,制度和行为相互影响的关系再次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主题。

选举制度的选择同一个国家的政党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外学者的研究更是关注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之间的互动性。法国学者迪韦尔热推出的单一选区制会导致两大政党体制,比例代表制导致多党体制的“迪韦尔热定律”对于研究政党体制与选举制度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会产生两大政党体制,这样的机制并不有利于多元化政党体制的发展,因此在东欧国家在创建选举制度的时候,多先使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之后又改革为比例代表制。由于比例代表制又会导致过多小型政党的出现,而不利于政党政治合理运作,一些国家采用议会当选的准入门槛,对小型政党形成制度上的制约。一些国家为了避免选举制度过分制约政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试图把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予以结合。

把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选举制度予以归纳和整理,不外乎有表 1 中所列的类型:

表 1 选举制度的类型

多数投票制 (Majoritarian)	相对多数投票制 (Plurality)	简单多数投票制(FPTP):英国、美国
		连记投票制(Block Vote):英国地方选举
	绝对多数投票制 (Absolute)	选择顺位投票制(Alternative Vote):澳大利亚
		决选投票制(Double Ballot):法国
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没有政党名册	单记非转让投票制(Limited Ballot):1993年以前的日本
		单记转让投票制(STV):爱尔兰
	附有政党名册	全国选区按比例分配:德国
		地方选区按比例分配:希腊

资料来源:Martin Harrop & William L. Miller, 1987, *Election and Voter: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Macmillan Education, p. 50.

通过表 1 的归纳,可以看到在一些主要的欧美国家,简单多数投票制依旧是最为简单方便的选举制度。简单多数投票制的基本原则是,凡是获得有效选票相对多数的候选人就是选举的胜利者,这一制度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实行单一选区,即一个选区选举一个议员,如果一个

政党在多数选区中获胜,既可以获得政权而执政。比例代表制是近年来各国采纳最多的选举制度,该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相对多数投票制所出现的代表性不足的特点,但是在扩大比例代表性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例性过大的缺点,因此大多数选择比例代表制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设定了“最低门槛”的条件。

本书通过国外学者所作的分析介绍也侧重于从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上观察制度和体系等因素对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本书的内容不仅涵盖国外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还涉及一些选举研究上的颇有争议性的理论话题,以便国内的学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国外政党和选举制度研究的状况。介绍实证分析方法也是本书编辑时的一个主要的思考。在国内政治学界,运用实证分析进行研究的论文正日益增多,出于推动国内学者从事方法论的研究的考虑,本书吸纳的论文也都是通过实证解析国家制度和政党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建立新的选举制度时产生的各种问题所进行的论证和分析;第二部分是介绍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方面所面临的新课题;第三部分收录了日本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如何因国内政治社会变化,进行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改革的论文。

本书的第一部分呈现了俄国和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新制度建立之后的特点。书中关于俄国选举研究的五篇论文和关于乌克兰、匈牙利、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的选举研究的三篇论文,详细论述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体制转型以来政党体制所发生的变化。《俄罗斯政党和选举体制的演变:以1999年杜马选举为例》一文论证道,俄国现有选举体制同1906年时的俄国选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历史的衔接,而现有的政党机制则完全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党体系。因此,只能说在俄国选举制度的改革寻求历史性回答的同时,政党体系则更多地在应对现实政治的挑战。俄罗斯选举



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国家层面的课题,也是各个行政区域层面的课题。《俄罗斯的州及共和国的选举制度设计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一文则指出,俄罗斯地方选举制度的设计适应了俄罗斯多元社会的特点,同时在国家层面同杜马制度相衔接,使得俄罗斯国内不同层次的选举制度上形成了历史文化脉络一体化的政党体系。

此外《转型时期俄罗斯总统声望的动态分析:文化压力对新制度选择》一文详细分析了叶利钦和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所展示的个人魅力的影响。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指出了俄罗斯民众寻求大国复苏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在尽可能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情况下,在当前的政治结构中继续维持普京个人魅力,以求文化结构和政治体制结构上的和谐统一。

第二部分则选取了美国学者对欧美国选举制度下的选民投票特点进行政治分析的四篇论文。美国是较早地开展选民政治行为研究的国家,构建了相当数目的政治分析理论框架。但是较多的分析显示美国选举体制中的一些基本模式并不被其他国家的学者所接受。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菲利普·康沃斯撰写的《党派性和政党制度的多国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在美国社会被学者广为接受的党派性分析模式其实在国外并没有显示出其普遍的理论意义。他承认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不一样,民众的政治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也大相径庭。《美国两党制所面临的挑战》一文则详细地分析了1968、1980、1992和1996年四次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的选民不满美国现有两党体制,将大量选票投给独立候选人的现象,分析了美国两大政党体制初显颓势的原因。而《政府机构、选举周期和总统否决权》一文则从政府决策同选举周期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角度,指出了第一任期的总统为谋求连任,会在政策上同议会进行更多的协调,以维持自己良好的个人形象。

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收集了诸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在选举制度上变化的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改革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选举制度。这一改变导致日本国内的政党体制也相继发生变化。20世